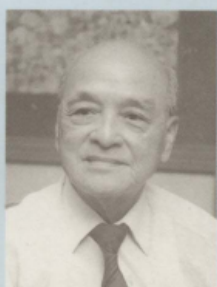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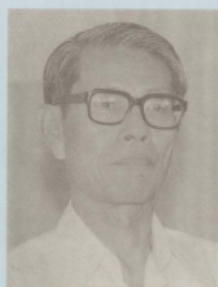


承襲與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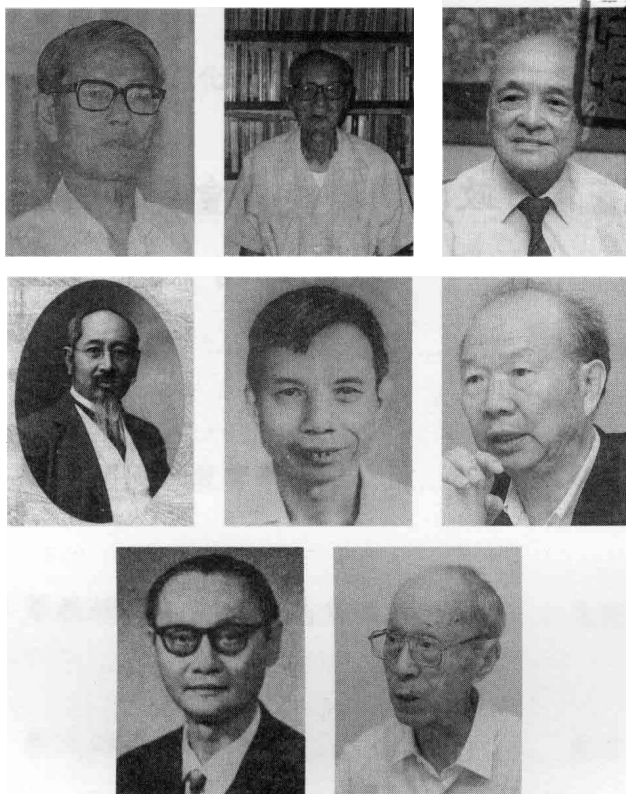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 文化篇

何國忠 主編



承襲與抉擇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 文化篇

何國忠 主編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台北・南港
2001 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
何國忠主編——初版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民 90
面； 公分

ISBN 957-671-824-4 (精裝)

ISBN 957-671-825-2 (平裝)

1. 華人 - 馬來西亞

577.2386

90022963

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

編 者：何國忠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782-2191；2782-2195

印刷者：易風格數位快印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定 價：新台幣 400 元 (精裝)

新台幣 300 元 (平裝)

GPN 1009006629 (精裝)

GPN 1009006133 (平裝)

ISBN 957-671-824-4 (精裝)

ISBN 957-671-825-2 (平裝)

編者/作者簡介

何國忠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博士。曾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師，現任職於馬來亞大學東亞系。編著有：《今我來思》（1993）、《塔裏塔外》（1995）、《中華文化之路》（與林水燦合編）（1995）、《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與林水燦、何啟良、賴觀福合編）（1999）。

李元瑾

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學士、南洋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1998 年至今受聘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助理教授。著有《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等書。

張翰璧

德國畢勒菲爾德（Bielefeld）大學社會科學院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學者，現任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朱泓源

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為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同盟會的革命理論》、《中國近代民族思潮》、《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等書。

崔貴強

南洋大學史地系學士、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碩士。曾任南洋大學助理教授及歷史系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講師、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研究員。著有：《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新加坡華人報刊與報人》、《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等書。

楊松年

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香港大學文學碩士、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新馬華文文學專書：《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與周未介合著）、《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戰前新馬華文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論析》、《大英圖書館所藏戰前新華報刊》、《新馬早期作家研究》、《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馬華文現代文學》等。

潘碧華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現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師。著有《傳火人》、《我會在長城上想起你》、《揚眉女子》、《誰在夜裏敲鐸》等。

陳鵬翔

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學士、臺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臺灣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文學創作與省思》、《多角城》，並編有《翻譯論》、《從比較神話到文學》等書。

序

華人族群在馬來西亞的當前總人口當中大約佔了四分之一。在馬來西亞近現代的發展史中，華人胼手胝足，憑著才智、勇氣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各自在不同的領域中開闢了一片片的天地，也開創了一種種的事業。這些前輩的作為，不僅令後人緬懷，也值得史家為他們立傳。

以往關於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的論述，有的是概括性的泛論或零星的人物、事件的散論，有的是專題式的深入探討，這些文獻已為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奠下基礎。但是全面性地勾勒出馬來西亞華人群像的著作，則仍然罕見。有鑑於此，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一直重視也期待看到這樣的學術著作出版。當我知道「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有意結合數十位學有專精的學者，以團隊的方式為馬來西亞華人寫史時，我即感到很興奮，隨即表示願意支助此研究與寫作計劃，因為我深信如果沒有這樣群策群力、集體合作的研究，則我們對於一兩百年來曲折起伏的馬來西亞華人歷史，將很難有比較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一系列三本書編撰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對馬來西亞（包括獨立前的新加坡）華人的記敘、論述和剖析，讓讀者更深入地認識、理解馬來西亞華人一兩百年來所經歷的過程、蛻變與轉型，同時也探討他們的歷史地位。

這三本書以馬來西亞華人活動的三個主要面向為焦點：一是政治，二是經濟，三是文化。在政治方面，本套書為八名政壇上的領袖人物立傳。這些人不論在朝在野，對華人權益的影響力都舉足輕重。在經濟方面，本套書共為十名以商養儒、對華文傳承有重大貢獻的華

人企業家作傳。在文化方面，本套書為八名對華文教育的推廣、華文藝文的創作、史料的整理卓有建樹的人寫傳。

因為有了這些獻身於馬來西亞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代表性華人，才使馬來西亞的歷史更加豐富，也反映出馬來西亞華人的多面和多元化。他們在歷史舞台上接力式地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情景，相互銜接、彼此激勵，不但成就了自己，也造就了馬來亞和馬來西亞的歷史。

綜觀這三本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的套書，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特性。首先，在本書的主人翁中，有許多人都已懷有馬來西亞本土意識。雖然他們具有華人血統，但是他們大都關心當地社會，也積極參與當地的發展。

第二，如果把這些主人翁的年代排比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連貫性。也就是說，透過這些不同年代的主人翁之間的人際網絡、重大事蹟等過程，我們看到馬來西亞華人歷史進展、綿延不絕的連續性。早從英國殖民時代開始，到二次大戰、被日本統治與對抗日本、戰後爭取獨立、獨立後爭取華人權益時期，以至到現階段，這些華人正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樣，一代接著一代出現，不絕如縷，也一代接著一代，不斷奮發圖強。

第三，在作者方面，這三本書的作者們多是訓練有素、深通當地歷史文化或政商的專家。他們來自臺灣、香港、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他們以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廣泛使用各種資料，深入查訪，而且互相參照、斟酌取捨，才能完成這三本堪稱巨著的作品。

整個來說，經由這三本書所建構起來的時空座標，以及各章節中所論述的詳實內容，我們能夠比較準確地抓住馬華人、社會和文化的群像。在「縱」的方面，藉由這些人物，我們見到一部馬來西亞華人奮鬥的歷史。在「橫」的方面，由於這三本書以政治、經濟、文化為主要面向，所以我們更可從中看到馬華歷史的主要橫切面。透

過這種縱向、橫向的透視，可說是把馬華歷史人物在時間上的經度，和社會關鍵面上的緯度兩者交織在一起，並為馬華群像勾勒出一個生動的圖像，也理出一個較清楚的脈絡。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這一系列三本書，是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所籌劃、資助、編輯並出版的學術專書。本計畫自成立以來，就致力於加強本院與國際學術機構和學者之合作及交流，並積極出版學術專書。一如前述，這三本書就是本計畫與「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多年期的合作計畫之成果，也正是本計畫推動的跨國合作研究的例證之一。對於這樣的成果，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在此，我們要向所有曾經參與這個合作計畫的同仁們致上最大的謝意，更謝謝林水燦教授多年來主持此一寫書計畫之辛勞。我們也希望類似的合作計畫，日後能夠繼續推展下去，並使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成果數量更多，品質更高，精益求精。

最後，本系列三本書獲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慨予補助出版經費，才得以如期出版，我要在此特別感謝張富美委員長和歐紫苑處長。



序於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2001 年 12 月

總主編序

中國史籍浩瀚，清人編《四庫全書》，其史部共分十五類，即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不過，具有崇高的權威性史書而被冠上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屬於紀傳體，足見此一體制在中國史書上的重要性。紀傳體史書以人物為中心，敘述當時的史實，創於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他所撰之《史記》共一百三十卷，其中十二卷本紀，三十卷世家，七十卷列傳（共一百十二卷）都是以人物及其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史篇。《漢書》一百篇，以人物為主體的傳記共占了八十二篇，即十二紀與七十傳。其餘正史，人物傳記所占的比例大致和《史記》及《漢書》相似。可見中國各代史家皆有為名人作傳的優良傳統。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各族在這片土地上開疆闢土，建國立業，經過長期的奮鬥和犧牲，奠下了進步繁榮的基石。華人何時開始移入馬來西亞雖不易考知，然而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為華人移民到馬來西亞來發展的高峰期是眾所周知之事。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華人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七，目前華人約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具有悠久歷史與淵遠流長之文化的數百萬馬來西亞華人，憑著勇氣、才智以及刻苦的精神，這一百多年來在馬來西亞土地上辛勤耕耘，為國家社會發展作出直接而且顯著的貢獻，有許多人還成了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科技等領域的傑出人物。在我們享受著國家、社會走向進步繁榮之際，那些湧現於歷史舞臺上卓爾不群的先輩，不只令人緬懷，也應獲得史家為之立傳，使世人認識他們的豐功偉績，並藉之激勵後人繼往開來，自強不息。

除了中國、臺灣、香港等地區以外，馬來西亞該算是最能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的一個特殊國家。雖然如此，華人社會在史料和文獻的保存與整理方面，尚無法做得令人滿意，遂令史料及文獻等散佚流失，導致不只世人無從認識這個地區的華人所以能夠立足生根，同時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的種種原因，甚至連馬來西亞華人對自己的歷史發展也所知有限。華社研究中心同仁皆深怕先賢一些重要史料若一直不受重視，不及時加以整理，馬來西亞華人歷史將留下無法填補的空白，造成不能挽救的損失，因此向臺灣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提呈合作研究馬來西亞華族歷史人物計畫書。幸蒙蕭主持人認同批准，且加以撥款資助這項研究計畫，特此致謝！

此計畫以馬來西亞（包括獨立前之新加坡）的政治、商業和文化三方面卓越華人為研究範圍，圈定二十多名聲望顯赫、功績卓著的代表人物為研究物件。第一類為儒商，入選者乃是對中華文化傳承有偉大貢獻的成功商人；第二類為政治領袖，入選者都是馬來西亞政壇上的翹楚，他們不論在朝在野，對華族的政治權益都舉足輕重；第三類為文化界的宏才，他們對華文教育的維護與推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史料的保存與整理，甚多建樹。幸運的是此計畫能邀請到臺灣、香港、澳洲、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的學者專家熱誠相助，分頭進行研究所指定的人物並撰寫其傳記。自1998年7月開始至翌年杪初稿都已擬就，為了使論文內容更充實，格式更一致，遂於1999年12月17日至19日於吉隆坡舉行一場非公開式之研討會。在會上，所有的撰稿人及特邀的一些學者評析討論各篇論文，供修潤時參考。

至於本計畫之撰稿原則，以事核為準，避免不符史實之杜撰編造；對人物評價，則力求公正客觀，“不虛美，不隱惡”。馬來西亞各領域傑出之華人既多，篩選自屬不易，邀請熟悉這些人物之學者專家為他們立傳，也煞費周章，搜集資料及進行田野和口述工作，又需時日，所幸一切工作尚能大致按計畫進行。如今儒商篇、政治篇及文

化篇三冊皆已編就，只待付梓出版，疏漏及錯誤之處，還請學者專家及讀者批評指正。

林水椽

序於華社研究中心

馬來西亞

2001 年 3 月

緒論

多元文化下的抉擇：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文化人

何國忠

一、前言

人類在不斷反省中進步，對長期被文化問題困擾的馬來西亞華人來說，在踏入新世紀時刻，更需要靜心反思從前所走過的道路。過去的文化人在開創文化新局面的過程中，有著許多艱難的經驗，他們究竟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在走向未來時，後來者是否可以從他們實踐的過程中獲得智慧和勇氣？

文化人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概念，只要一切文史領域中曾經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們，無論是以高尚人格或創造性發明進入成功者的先烈，還是以失敗的代價成為後來者前進道路上的一塊階石，只要是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繼往開來認真付出過心血與才智，只要是曾經為尋求真理，捍衛真理而不屈鬥爭過，這樣的人，這樣的知識份子，都應該有人為他們立傳。因為他們的一生，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發展的最好見證。

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馬來亞華人文化氛圍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檳城就有私塾教育，但是可考的華文教育機構，則是 1819 年在檳城創辦的五福書院。同一個時候，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馬來亞各地都有方言學塾的設立。但是成果不好，課程和教學都很陳舊，英國政府讓華文教育自生自滅。薛福成（1838-1894）在 1893 年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檳榔嶼城建嶼之東北，英人名卓耳治城。……英設義學四十二所，教華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來由者三十二。”¹

薛福成的閱讀報告是可靠的，當時的情形是西風壓倒東風，華文教育的發展仍然上不了軌道。陳省堂（1861-?）在 1894 年批評好攻西文的學生“以毛亞抹怒為千古第一救世之聖人，竟不知我國歷代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何人也。”這位成長於新加坡，不忘祖國的峇峇對華人庇於蠻夷諸多不滿，因而感歎“世風日下”。²早在 1886 年鄒代鈞（1854-1908）訪問新加坡時也有如下的看法：

華人居此者……其衣冠語言、禮儀風俗，尚守華制，惜文教未興，子弟之聰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聖經賢傳竟不與目。³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既然“衣冠語言、禮儀風俗，尚守華制”，可見華人還不至於完全忘本忘祖。只要有人努力，文化的傳播自然可以運作如常。

¹ 薛福成光緒 19 年 10 月 25 日記，見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收於鍾叔河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5），卷 9，頁 874。

² 陳省堂：〈祀非其鬼〉，葉鍾靈編：《陳省堂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頁 103。有關陳省堂的生平，見同書〈導論：陳省堂：新加坡第一位出生的華文作家〉，頁 1-22。

³ 鄒代鈞：《西征紀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15 冊（臺北：廣文書局重印，1964），頁 9535。

的確如此，保存中華文化，或者要當華人的心態不曾泯滅過，南來的文化人或知識份子在這方面一直都循循善誘。《叻報》在 1889 年 1 月 19 日感歎“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誦習英文，而於華文一端，轉從其略。”因而指出：“今日之英文，固為時尚，有志者實不可以不學，然身為華人，則當為之兼習中西文字，固不宜徒習西文也。”⁴

有一點應該指出，老百姓不念書或者書念得不多，倒不是不願當中國人，而是不能覺悟到教育的重要性或者沒有機會接受教育。鄒代鈞所謂的“入西塾”的“子弟”，都是有錢人家。華人的文盲率在當時相當嚴重。馬建忠（1844-1900）在 1881 年赴印路過檳城時，被安排和一些商人見面，就很洩氣地說“言語不通，以英語問訊，但伊等英語又不能深解”，最後，只能托人以閩廣語，“為之傳譯”。⁵

1877 年滿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置領事以後，文化傳播的工作雖然顯得較有規劃，但也得等到左秉隆（1850-1924）及黃遵憲（1848-1905）上任的時候，才看到新的氣象。左秉隆和黃遵憲都是有文化使命感的官員。當地輿論界對二人讚揚有加，其中《叻報》對左秉隆掌管新加坡時做了這樣的報導：“叻中書塾，除自請儒師以及自設講帳者外，其餘義塾，多至不可勝言”。⁶而黃遵憲則被喻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任滿之時《星報》這樣形容他：“蒞任以來，籌賑災黎，振興文學，保護華民。”⁷

⁴ 《叻報》，1889 年 1 月 19 日，引自陳育崧：《椰陰館文存》第 2 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頁 227。

⁵ 馬建忠：《南行記》，《小方壺輿地從鈔再補編》，現收於《小方壺輿地從鈔補編再補編》第 6 冊（臺北：廣文書局重印本，1964），第 10 帙，頁 7。

⁶ 《叻報》，1890 年 3 月 13 日，引自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椰陰館文存》第 1 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頁 123。

⁷ 《星報》，1895 年 3 月 11 日，轉引自葉鍾鈴：《黃遵憲與圖南社》，《亞洲文化》，第 15 期（1991），頁 121-127。

左秉隆、黃遵憲都是文人出身，對於李鴻章（1823-1901）目睹西人湧進中國而感歎這是“中國近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他們都心有戚戚焉。⁸ 十九世紀末期，許多知識份子覺悟到教育不發達是民族積弱的最大因素。在他們的鼓噪下，1898 年清廷頒佈“國是”詔，指示全國進行教育改革，建立起現代的教育制度。同時又鼓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人參與。興學辦校的思想，一波一波接連而至。

早期馬來亞的中華文化傳播和愛國意識是分不開的。康有為（1858-1927）在這方面的努力更是異軍突起。康有為南來以後，要新馬人民關心國事，他不會坐失任何一個向人灌輸救國救民思想的機會。他目睹中國華僑在美洲等地被逐被欺而對比南洋華僑。在他看來，南洋華僑之所以無事，“雖賤辱而尚未至極地者，以南洋人少，土人皆愚，皆有待於華人者。”⁹

所謂土人皆愚，並不代表華人就聰明，上文已經指出當時華人讀書不多。康有為觀察的只是一些表面現象。但是，康有為所思考的不是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地方對他而言不是一個落葉歸根的地方，世世代代定居這裏是康有為所不能想象的。我們可以這麼詮釋康有為的話：第一，殖民地政府總有一天不需要華人，這只是時間問題，華人最後都得回去中國。第二，只要中國強大，再也沒有人敢再欺負中國人。不管是第一或是第二個含意：中國都得從這世界站起來，換句話說，愛國才是康有為所要傳達的意思，愛國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雖然康有為感受到西學的重要，提出要多讀西洋著作的主張，但在政治上，他始終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忠君愛國，事事都以中國文化為依歸。康有為在馬來亞一如過去在中國的做法，推動孔教會的設

⁸ 李鴻章的話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第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奏稿，第19卷，頁677。

⁹ 〈仰光演說〉，《檳城新報》，1903年8月29日，引自張克宏：〈康有為在新馬〉，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頁264。

置，作為他保教保國的部分活動。憑著他個人的聲望，其主張很快得到回響，新馬報章如《於南新報》、《日新報》等都支援他，會所在馬來亞紛紛設立。新馬華人史專家顏清湟以下的結論：“在新馬孔教復興分子的眼裏，恢復了生氣的孔教是中華民族強大的源泉……它將使中國振興和富強，使她擊退外國的侵略並在現代世界上佔據應有的地位。”¹⁰

說到中華民族的強大，有一點值得補充。當時的一些文化人極為擔心華人淪為蠻夷，1891年有一篇文章如此寫道：

中國移民娶馬來土婦為妻、將所生之子送往學西語，以利與洋人交往。……設若幾十年甚或幾百年之後，彼等便將完全忘卻華語矣。屆時，成千上萬之中國人勢將淪為蠻夷，披頭散髮，左袒左襟也。¹¹

到了康有為推動孔教以後，這種自覺更被化成行動。1899年吉隆坡通過了尊孔的決議，決定在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的誕辰時放假一天，所有商店在這一天都停止營業，到同善醫院去參加祭孔儀式。1902年新加坡成立孔教會以後，孔教復興運動的中心轉移到新加坡，由林文慶領導。林文慶自小就受英文教育，1892年考獲愛丁堡的醫學士學位，次年回新加坡，是當地有名的醫生。林文慶的中文是到了大學以後才自修的，以後心即被降服，對中華文化更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對儒家思想情有獨鍾，在比他年長十一歲的康有為的號召下，林文慶的文化使命感即刻發酵，成為這個運動的靈魂人物。¹²

¹⁰ 顏清湟：《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267。

¹¹ 《星報》，1891年7月27日，轉引自顏清湟（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頁273。

¹²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頁276；顏清湟（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62。

居於政治因素來到馬來亞的著名人物不只康有為，還有孫中山（1866-1925）。當孫中山發現本地有足夠的條件成為革命基地時，即策動其同志展開一系列的宣傳運動。1906年孫中山抵達新加坡，寄居晚清園，召集一批同志組織同盟會，繼而在吉隆坡和檳城設立支部，擴大影響。為了爭取支援，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派在1907年創辦《中興日報》，與康有為所領導的《南洋總匯新報》對抗。

孫中山所做的工作相當多，其中包括辦報、印書、創辦書報社、辦演講與集會以及戲劇表演。他和他的同志積極地創立新式學校及夜學，檳城的鍾靈、崇德、日新、益華；吡叻的光華、達才、新華；森美蘭的中華、柔佛的培智等都是由他們創辦的華校。¹³ 通過這種無孔不入、滲透力極強的活動中，他們最後成功地爭取到了維新派的支持者，並且將文化的發言權從維新派手中奪了過來。

中國近代史充滿了恥辱，在不斷遭受列強和日本瓜分的情況下，海外人民一直都有中國將滅亡的憂患，當救亡意識成了華人的核心思想以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和政治的符號當然就更加刻骨銘心。在文化和政治上，新馬的華人沒有、也不曾想過可以離開中國的束縛。以五四運動為例，當白話文運動開始的時候，新馬亦步亦趨。¹⁴ 而各地的華小在五四運動後，也都紛紛在同一時刻將華文課本由文言改成白話，教學媒介語也由方言改成華語。在一片向西方學習聲中，華文中學不只在馬來亞各大城市中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這些學校最大的特點是增授英語等實用課程。這樣的革新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

¹³ 林水燦：〈獨立前華文教育〉，林水燦、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2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聯合會，1998），頁219。

¹⁴ 方修：〈總序：馬華新文學簡論〉，《馬華新文學大系》第1集（理論批評）（新加坡：世界書局，1972），頁3-20。